

序

香港回歸中國 20 周年，也是「一國兩制」政治構想在香港實踐的 20 年。回歸後，香港經歷了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遷，取得不少驕人的成就；但同時，香港在此期間的發展，也折射出一些更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在過去 20 年，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維持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特區政府致力把香港建成「亞洲國際都會」（伍美琴），香港的競爭力和教育水平也處於亞洲乃至世界前列（沈建法和紀緯紋，侯傑泰），法律和公共醫療服務體系完備（蔣型嘉和 Gonzalo Villalta Puig，熊志添、馮康和楊永強），全球化程度領先世界，文化多元多彩，政府廉潔透明，治安良好，資訊、通訊、交通等基礎設施先進（宋恩榮），多樣化的公營房屋滿足了近半港人的住屋需求（鄒經宇和李響）。這些都是香港 20 年來發展無可置疑的成果。

然而，回歸後逐漸浮現的問題也不容小覷。首先，民眾尚未準確把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如中央與特區政府的行政、法律關係，尚有待規範化和具體化（劉兆佳），以《基本法》建立的憲制架構面臨諸多挑戰（蔣型嘉和 Gonzalo Villalta Puig），香港的涉外地位也欠明確，一直在「一國」和「兩制」之間游走（沈旭暉和陳偉信）。

其次，香港的內部矛盾日益加劇，甚至邁向撕裂，在許多問題上，社會缺乏共識，增加了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困難。社會

矛盾的首個來源，是核心價值世代更替所形成的張力。年輕世代成長於穩定和繁榮的環境，價值觀從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轉移，不同世代對社會發展方向和施政優先次序各有取捨（張妙清、鄭宏泰和尹寶珊）。社會矛盾的第二個來源，是香港與內地加強融合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衝擊。內地移民和旅客數量飆升，除暴露兩地思想價值及生活方式的差異外，亦令部分香港人因感到不能合理分享成果，或付出過高社會代價，而質疑開放、多元和包容等價值（鄭宏泰和尹寶珊）。當內地日益壯大的軟實力令香港人感到本土文化備受衝擊時，許多人，特別是青年，會擔心香港人奉行的價值觀，如法治、自由受到威脅，致使社會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態度分歧擴大（趙志裕）。香港的既成制度卻未能自我更新，吸納青年的價值觀和社會需求，因而釀成近幾年的政治認受性危機（馮應謙和鄧鍵一）、對國民教育的爭拗（侯傑泰），遽然冒起的激進主義和「本土分離主義」，更企圖全盤否定「一國兩制」框架（劉兆佳）。「本土派」對公民社會強調的普世價值，如包容、關懷弱勢等提出質疑，反對公民社會團體對內地新移民的支援（陳健民和阮耀啟）。社會矛盾的第三個來源，是市民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感受顯著上揚，包括擁有高等學歷的年輕人也看不到向上流動的機會，因而感到挫敗和失望（黃洪、張引和鄧敏如）。隨着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矛盾加劇，勞資關係亦愈趨複雜、功利及政治化，2007和2013年爆發兩場大型工潮，提高了僱傭雙方對勞工權益的關注（敖恆宇）。

第三，香港一貫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原則，在社經生活中，政府多秉持「市場主導，政府推動」，甚至社會福利與市場經濟二元對立的觀念，僅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例如，香港的貧富懸殊自1980年代起愈加嚴重，堅尼系數直迫聯合國訂定的0.6危險線（馬麗莊和夏麗麗），政府依然沒有針對這問題採取進取的應對策略。香港現行的強積金制度對退休後

的生活保障明顯不足（何靄婷、黃芷翹和馮海嵐），針對老齡化和長者貧困問題，政府不久前才提出終身年金計劃，具體方案和成效還要拭目以待。同時，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措施鼓勵生育，及減輕家庭照顧兒童的壓力，釋放尤其是女性勞動力，以從根本解決老齡化、勞動力短缺，和兒童貧窮等關鍵問題（馬麗莊和夏麗麗）。針對在職貧窮和勞資關係緊張的問題，政府在勞工界強烈要求下，在 2010 年通過《最低工資條例》，這對香港而言，不啻是破天荒之舉；但其他勞工保障，如標準工時立法，仍舉步維艱（敖恆宇）。性別平等亦未能進入政策制定的主流，既缺乏負責協調政策和立法的中央機制，以提升女性的地位和打擊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亦不訂立家庭政策，以減輕在職女性的家務負擔，從而紓解家庭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蔡玉萍和張妙清）。此外，社會對少數族裔和內地新移民的態度，多是取決於他們的社經地位，市民因擔心社會福利分配或身分群體邊界劃分等問題，而排斥社經地位偏低的社群（方偉晶和干一卿），政府亦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服務，以保障弱勢社群的權益，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最後，政府的政策多缺乏連續性和前瞻性。香港長期以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和旅遊業為經濟支柱產業，缺乏新的增長點（宋恩榮）。學術界和社會達成共識，認同香港應該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以確保經濟持續發展，但歷任特首的政策重點和方向各有不同，導致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嚴重滯後（黃錦輝）。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門經常缺乏協調，傾向被動地應對社會變化和挑戰（馬麗莊和夏麗麗），也沒有制定綜合考量社會、經濟與環境因素的整體、長期、可持續的城市發展策略（伍美琴）。

香港亞太研究所一直致力研究香港的發展歷程和核心課題。我們邀集香港中文大學在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從多方面闡述和討論香港回歸 20 年的發展，以及未來的走向。通過這些

努力，我們試圖勾勒出香港發展的總體脈絡，總結「一國兩制」的經驗和教訓。本書共收錄 25 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政法發展、價值取向與對外互動；第二部分聚焦於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第三部分剖析社會發展與民生變化。下文將簡介各章討論的具體問題和作者的基本看法。

第一部分收錄八篇論文，分別從政治、法律、文化和社會的角度，闡述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困難和啟示。

劉兆佳認為香港回歸雖有 20 年之久，仍無法建立一套各方願意遵循的政治遊戲規則，近年更冒起新的激進勢力，鼓吹各類「本土分離主義」。中央政府遂由過去的「不干涉」態度，轉為積極運用制度手段，主動釐清和確立香港的政治遊戲規則，包括中央的權力，中央與特首、主要官員、立法和司法機關的關係，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等。這政策轉變勢必引發反對勢力的激烈抗爭，但劉兆佳相信，為了維護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中央會擇善固執，香港各方也會作出適應，從而煥發新的合作機會。

蔣型嘉和 Gonzalo Villalta Puig 從法律角度剖析同一問題。他們強調，妥善處理中央與特區政府關係的關鍵，是解決香港憲法性質的《基本法》所面臨的挑戰。作者認為，回歸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只做過五次解釋，沒能達到足夠的數量，亦未觸及深刻的法律問題，以發展香港的憲法體系。此外，很多積習亦阻礙憲法的完善，如學術學理研究不活躍、香港業界質疑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專業性、兩地司法機關缺乏制度化的合作、香港終審法院與人大常委會沒有真誠互動等。香港法院和人大常委會增加對話和互信，是正確理解和切實執行《基本法》的前提。

陳健民和阮耀啟從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角度，系統地分析了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他們指出，服務性與倡議性的公民社會組織不但與政府保持不同的關係，回歸後也有迥異的發展，前

者致力在不挑戰現有制度的情況下，通過跨界合作，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服務；後者則以社會運動方式推動轉變，積極投入保育、爭取民主和建立本土認同等倡議性工作，近年更與急速發展的網絡社會結合，發揮前所未見的政治動員能量。兩類組織都悉心以社會創新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彼此殊途同歸，令公民社會展現強大的生命力。

張妙清、鄭宏泰和尹寶珊運用民意調查所得，闡析香港核心價值的轉變。他們發現，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相當多元，縱有輕重之別，如對法治、自由和公正廉潔的重視明顯偏高，但絕非擁抱單一價值。社會價值取向雖朝後物質主義轉移，至今仍以崇尚物質主義者居多，而且會因應環境劇變而出現波動。社會價值觀的轉移主要循世代更替來進行，年輕與年長世代的成長環境截然不同，致使彼此的價值取向涇渭分明，年輕人一直較年長者重民主、輕安定，近年，兩者對法治、自由和公正廉潔的取向差距，更呈擴大之勢，掀起社會對「世代之爭」的關注。

回歸前後，部分香港人擔憂原有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或會遭到侵蝕，對政治發展、政府施政等問題日益關心。民意調查作為一種客觀、科學、能迅速反映即時民意走勢的工具，正好產生了監察政府施政的作用。香港的大專院校多成立電話民意調查機構，藉觀察民意變化，了解社會發展。趙永佳、沈國祥和葉天生討論了香港民意調查的發展和面臨的挑戰。根據香港亞太研究所自回歸後的調查所得，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三位特首領導的政府，民望都出現高開低走的趨勢，公眾評價每況愈下，為施政帶來壓力，也引起政府高層的關注。一些親政府的建制派人士，更質疑民望電話調查的可信性，產生了有關民望調查的風波，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作者透過嚴謹的數據分析，說明符合社會科學調查標準的固網電話調查，至今仍較準確地反映香港民意，可以為政府施政提供可靠依據。

香港人對內地和內地人的態度，也是兩地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碰撞的結果。鄭宏泰和尹寶珊先從人流的角度，簡述殖民歷史對兩地關係的影響；繼而運用官方統計，勾勒回歸 20 年來兩地人民跨境往來的模式和變化；並根據民意調查所得，追蹤民眾對香港人回內地、內地人來香港和兩地強化關係的觀感、與內地人的接觸經驗和印象轉變，以及對相關政策的取向。各方數據清楚展示兩地已形成「雙向」交往的格局。兩地接觸變得全面和頻密，不但暴露了彼此的文化差異，亦惹起打亂香港生活環境、分薄資源、拉高物價等顧慮，加上兩地發展勢頭逆轉，社經距離大幅拉近，香港人的相對優越感開始動搖，轉以「文明水平」差距來維持本土的身分認同。「雙非」嬰兒、水貨客等問題，進一步激化兩地矛盾。香港人對兩地融合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效應，均漸失信心，心態遂從認同、樂觀，朝日益抗拒轉變。

沈旭暉和陳偉信從外交角度討論香港與中央政府的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的授權來自《基本法》。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涉外關係保留了不少灰色地帶，反映香港在中國與其他國家地緣政治博弈的角色。一方面，「一國兩制」須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香港的國際角色也是中國走向國際化的重要資產；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一直避免香港問題過於「國際化」，以免影響國家對香港的絕對主權及管治。香港涉外關係的另一面向，是早已與國際接軌的公民社會及相關制度。「由下而上」，即由企業及公民社會主導的民間外交，是香港涉外關係的重要一環，也在中國外交政策佔一席之地。因此，要將香港涉外關係制度化，關鍵是如何在「一國」與「兩制」之間找到平衡點，既可維持中央政府對香港處理涉外事務者的信任，亦不至於影響民間自主，以及活潑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項目。

趙志裕也認為文化價值差異，是解釋 2008 年後香港人的中國認同不升反降的原因。香港人能接受甚至歡迎在物質範疇內

出現的文化混搭，卻排斥和抗拒在神聖範疇內，如奉為核心價值的法治、廉潔、自由中，出現的文化混搭。當文化接觸凸顯了兩地文化間的價值差異，同時，民眾覺得本土文化的生存受到威脅，對前景感到不確定時，便會更關注本土價值被侵蝕。中國日益壯大的軟實力，令香港青年既欣賞中國的人和物，又因擔心中國軟實力的擴張，會侵蝕本土文化的核心價值，而仇視中國的人和物。兩地增加接觸，令香港人更注意到彼此在核心價值上的差異。認同中國文化的香港人，因中國軟實力的壯大更受鼓舞，更積極在香港弘揚中國文化；然而，亦有香港人擔心本土價值被侵蝕，結果是社會撕裂日甚一日。

本書第二部分審視回歸後的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共收八篇論文。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國際經貿和金融中心，發展之道是在區域以至全球的競爭中取勝。本部分作者從不同角度剖析香港的競爭力問題和出路，他們都指出，香港原來賴以提升競爭力的傳統四大支柱產業，即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和旅遊業，都面臨嚴峻的挑戰，難以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香港應該抓住機遇，利用內地發展的契機，積極推動產業結構多元化。

宋恩榮分析了四大支柱產業在 2000 至 2015 年間的發展，指出香港經濟已缺乏新的增長點，傳統行業正面對不同的挑戰。在八個國際或城市經濟競爭力排名中，香港的表現不如理想，僅在兩個國際排名維持領先地位。提升競爭力的主要手段，是增闢土地、輸入勞工及技術創新，鼓勵經濟多元化發展，並加強與內地的經濟合作。然而，香港內部矛盾尖銳，政府決策及執行能力不足，以至增闢土地進展遲緩，輸入勞工及發展創新科技成效未彰，亦沒有充分利用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香港須不斷提高服務業的質素，才能獲取 CEPA 的潛在利益，更應掌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嶄新契機，善用作為國際傳媒中心

和民間團體匯聚地的優勢，以及處理多元文化社會矛盾的經驗，為國家提供軟實力的多元對外平台。

沈建法和紀緯紋透過香港在三個城市競爭力指數排名的變化，了解香港競爭力的現狀和可改善的領域。結果顯示，香港選對了發展道路，通過物流、經貿和金融等產業，取得驕人的成就；然而，在科研、教育和人才培訓等方面的投入和產出，則相形見绌，如物流業未能跟上高科技應用、即時數據、非運輸的供應鏈整合和設計服務等產業升級大趨勢，金融產品也面對多元化和科技應用的重大挑戰。此外，整體經濟和企業應對挑戰的轉變過程既不夠快速，方向也不夠明確。香港必須制定領先的產業戰略、善用科研機構、加強科技應用、打造科技帶動新舊產業發展的營商環境，再配合及時和有效的教育、人才、土地、監管和法規等綜合措施，才能發展新產業結構、提升經濟產出能力，和維持高度競爭力。

黃錦輝回顧了香港在創科領域的發展。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指數評比，香港的表現不俗，但部分評分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實存在隱憂，主要在於未來基建發展緩慢，影響競爭力；金融發展持續下滑，不利經濟轉型；以及創科發展未如人意，削弱創新能力。幸而政府近年已展示了發展創科產業的決心，創意、創新及創業文化突飛猛進。與內地相比，香港在國際市場較具競爭優勢，主因在於資金流、物流、人流、資訊流及國際都會文化等各方面擁有完備、安全的軟實力。內地商機處處，香港應發揮其在基礎設施、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以及創新等領域的軟實力優勢，在內地市場發展，促進兩地互惠雙贏。

莊太量梳理了回歸後的金融發展與挑戰，指出銀行業、證券市場、債券市場和保險業，都取得不同程度的進步，近年崛起的金融科技為行業帶來新的機遇，但也衝擊着傳統金融的媒介作用，其中以支付業務及零售銀行面對的變革最為顯著。針

對金融科技發展的落後，金融管理局正牽頭建立新的快速支付系統，屆時可提供一個讓銀行、支付工具營運商，以及市民享用的跨銀行即時支付轉帳服務。此外，新興的網上貸款及眾籌平台，透過第三方網上平台，免去銀行的中介角色，以實現企業與個人，甚至個人與個人之間借貸雙方的匹配。但是，現時香港對金融科技的監管相對落後，如何在保障使用者與不阻礙創新之間取得平衡，是香港能否在金融科技領域急起直追的關鍵。

羅祥國認為香港經濟轉型的出路，是成為帶動珠三角朝大都會發展的主導城市，以高增值服務業的強項，服務內地及亞太區。因此，除現有的四大支柱產業外，應加入房地產和建築業，以及文化創意產業，政府必須制定適當的政策，以鞏固這些仍具優勢的產業持續發展。政府在制定新產業政策時，必須包括五個核心部分：政策不會違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採用「產業集群」理論，協助評估新產業成功「集群」的可行性；訂定可量化的經濟政策及產出指標；確立檢討政策目標的時間表和程序；以及政策應有持續性和可預測性。

伍美琴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根據聯合國《新城市議程》訂定的框架，審視香港的城市建設。該議程提出三大原則：「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確保可持續和包容型的城市經濟，以及確保環境可持續性。然而，香港在建設「亞洲國際都會」的過程中，不斷開發城市、發展房地產、落成大型基建，卻犧牲歷史建築、農地、郊野公園，既破壞社區網絡和非正規經濟系統，亦奪走其發展的空間。昂貴的土地資源影響可負擔房屋與社區設施的供應，並導致城市住房和社區發展不均、社區環境融合持續惡化、地區經濟日益萎縮等問題。城市環境充滿挑戰和風險，香港須達成共識，明白在發展過程中充分尊重人的需要和自然環境的重要性，盡快制定促進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

策略，建立綜合、全面、跨界別的溝通機制，以及落實真正「以人為本」的參與模式。

香港的勞資關係也發生了本質變化。敖恆宇分析了香港 20 年來勞資關係的演變，發現基於互信的「社會交換」關係逐漸消失，短視和功利的「經濟交換」關係已成為主調，因此，僱主為控制成本和增加環境適應力，會刻意提高內部的勞工彈性和強調員工之間的競爭，如增加短期工、靈活調動和延長僱員的工時、要求僱員擔任不同職務、取消固定薪酬、採用常規化的表現考核等。此等措施造成了員工工作滿意度偏低、流失率偏高、工作消極等後果，也必然加劇勞資矛盾。然而，政府除在 2010 年通過《最低工資條例》外，勞工政策實乏善可陳。工商界與勞工界在標準工時、強積金對沖機制，以及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等利益對立議題上，一直各不相讓，加上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未來的勞資關係不容樂觀。

香港土地稀缺，為確保環境品質和土地儲備，政府對土地開發限制嚴格。目前，居住用地和公營房屋用地各僅約佔全港土地的 3.7% 和 1.4%。鄒經宇和李響從規劃、設計、營建、政策和配套服務的角度，探討公營房屋政策如何應對不同年齡層和社會階層的居住需求。從 1950 年代起，政府透過城市規劃與建屋計劃緊密結合的策略，不斷推出順應不同時期社會狀況和市民需求的住屋政策，如 1970 年代的居者有其屋計劃、1990 年代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及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等，建立了以人為本和階梯式的住房保障體系，為近半市民提供公營住房，為新市鎮的發展以至社會的長期穩定奠定基礎。在重視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轉變、自然資源短缺和講求環境保育的形勢下，住房發展正面臨眾多挑戰，包括推動社區和住宅環境的適老更新、兼顧土地供給在選址和環境上的綜合效益、提升公營房屋設計的個性化等。

本書第三部分聚焦於回歸後的社會發展和民生變化，共收九篇論文。

生活質素對社會和諧有重大影響。黃洪、張引和鄧敏如運用「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探討市民的福祉變化。該指數涵蓋五大生活範疇，共有 18 項客觀指標和 5 項主觀指標。在 2002 至 2015 年間，香港的整體生活質素呈「M」型發展，五大生活範疇的分類指數則變化不一：健康範疇發展平穩，社會範疇波幅明顯，文化及休閒範疇持續上升，經濟範疇持續下降，環境範疇則平穩上升。相對而言，社會和經濟範疇對整體生活質素具有較大的影響。社會範疇的言論自由指數及政府表現指數，較易受到重要政治事件所左右，言論自由指數於 2015 年創下 14 年來最差記錄，反映日積月累的社會矛盾所造成的緊張氣氛，以及近年多場社會運動所導致的政治分化，令市民對表達意見愈趨謹慎；政府表現指數於 2007 年到達高峰後便不斷尋底。經濟範疇的分類指數於近年屢創新低，物業負擔成本倍增、租金上漲、工資收入沒有明顯的實質上升，這些因素皆嚴重拖低市民的生活質素。此外，不同年齡組群對自己和社會現況的感受不盡相同，18 至 40 歲組群的生活滿意程度指數和壓力指數，均顯著低於中年和年長組群。

侯傑泰回顧了教育領域的重大變化和政策改革。回歸後，教師資格和師生比例均持續改善，官津學校從 2009 年起實施小班教學，惟小班與增效的關係，仍未有定論。在學制方面，三三四學制，即高中三年和大學四年，各於 2009 和 2012 年成功落實。在課程方面，學制改革令高中學生減少修讀科目，但必修通識科。通識科已受到不少批評，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報考理科的學生數量跌幅達半，這既未符文理並重的本意，亦不足與推動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的策略相輔相成。至於新加的一年大學教育，多集中於語文、資訊科技、通識、社會服務等課程。此外，政府從 1998 年起增撥經費，協

助各級學校在教與學中利用資訊科技，但資訊科技對學習的效果也是爭論不休。在考試及派位方面，政府於 2000 年取消中一派位的學業能力測驗，並將五個派位組別改為三個，以減低學生的壓力；近年的爭論則集中於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存廢。最後，政府於 2008 年起實施 12 年免費教育，於 2017 年延長至 15 年，包括幼稚園教育。香港專上教育膨脹剛現，19 年免費教育是否可行和可取，需要教育經濟學者共同研究。

熊志添、馮康和楊永強指出，醫療領域取得多項實質改善，如嬰兒死亡率、人均壽命、公共衛生、公共醫療投入和醫療科技等，均持續改善。然而，醫療體系仍面對重重挑戰，包括人口增長、人口老化，以及慢性和新傳染性疾病增加所帶來的疾病負擔；市民期望上升；新科技令醫療費用上漲；體制改革未及基層醫療角色、公私營失衡、服務分隔、融資等問題。克服這些困難需要更多資源和革新，政府雖在 2009 年開始增收醫學生，以彌補金融危機期間因節約開支而刪減的名額，但不能期盼立竿見影。醫院管理局亦致力改善效率和管理需求，推行新管理概念，下放權力，釐清權責，加強機構管治，定立服務規劃和標準，採用醫院聯網的形式加強組織效能，並建立公私營醫療資訊共享平台。政府除增加投入和着手改革外，也在設施、人力資源和服務思維上工作，如改變對醫院管理局的撥款模式，鼓勵更多發展日間和社區醫療，訂下往後十年醫院重建藍圖，建立高效的管治架構和監管問責機制，加強醫療系統內的領導培養和提拔，營造以人為本的機構文化等。

馬麗莊和夏麗麗通過回顧過去 20 年多項重要社經政治指標的變化，展現在經濟上步入後工業化時代、政治上民主進程深化，和社會持續老齡化的環境下，社會政策和福利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引入社會發展視角和「社會投資」理念以改革傳統福利觀念和架構的迫切需要。兒童作為社會未來重要的人力資源，其照顧和發展，與個人、家庭福祉及社會長遠發展都緊

密相連，因而是社會投資的關鍵，對兒童的培育也應由各方共同承擔。然而，兒童照顧服務的需求和供給，在量和質均出現鴻溝，兒童照顧需求與提升父母社會勞動參與率之間，也形成張力，當前的「家庭責任主導、政府補救」模式已顯不足。政府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進行家庭友善政策、兒童照顧服務供給和質素監管、對一般及困境家庭的財政津貼，及兒童工作人員職業發展架構等方面的投資和改革，以鼓勵勞動生產、提高家庭的經濟能力、減輕育兒壓力和提升生育率，並確保一般及有特殊需要兒童都受到高質素的照顧和成長機會，亦為未來社會建設人力資源，二者相輔相成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與發展。

丁國輝從不婚和離婚的趨勢，討論香港婚姻制度在近年的變化。經濟發展與市場化有助個人主義蔓延，個人對家庭和親屬關係的依賴下降，婚姻目的與生育日益割離，結婚也不再是人生的必然經歷。回歸後，未婚率持續上升，45至49歲男性從1996年的7.5%增至2016年的16.0%，女性則由5.9%升至15.2%，高學歷女性更已高達25%。但是，這不表示香港人對婚姻制度失去信心，或對婚姻不感興趣，而是找不到合適對象。怎樣提高婚姻配對效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香港自1972年通過「無過錯離婚」條例後，離婚率一直上升，至2006年才穩定下來，約為每千對婚姻與十宗離婚之比。這水平雖然不低，但不至於對婚姻制度構成嚴重衝擊。教育是穩定婚姻關係的重要資源，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離婚率有望下調。高學歷女性的未婚率雖偏高，但離婚率偏低，兩者有互相抵銷的作用。

蔡玉萍和張妙清先闡述回歸後香港就女性權益所作出的政策工作，包括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北京行動綱要》的進展，繼而總結女性在教育、經濟、貧窮、健康、遭受暴力對待、家庭角色、領導地位，和媒體描述中的現況，並回顧新來港及少數族裔女性、女童等弱勢群體的處境，以及提升女性地位的機制。她們發現，雖然政府已從機制入手來推

動兩性平等，如制定反歧視條例，設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女性的生活條件和機會已有一定改善，性別不平等依然於眾多領域延續。如在教育方面，教育過程中的性別偏見，以至媒體對性別定型的渲染，仍普遍存在；在經濟方面，性別薪酬差距不但持續，兩性間和女性間的職業分化，均愈趨嚴重，加上女性單親家庭和長者數目都大幅增加，女性貧窮問題正急劇惡化；在家庭內，配偶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照顧子女和家務勞動上不平等的性別分工，皆亟待解決；在公共領域，女性除在政治和公共事務上的發展滯後外，仍然是性暴力和罪行的主要受害者。政府需為提高女性地位確立發展目標，制定策略，推動更多的政策和立法工作，並建立機制，監測和評估政府推動兩性平等的成效。

近年，青年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政治參與和發展機會，均成為社會輿論和公共政策的焦點。馮應謙和鄧鍵一運用三個概念，即錯軌、錯置、離根化，從結構層面闡釋青年、制度與社會轉變的關係。首先，年輕和年長世代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已出現錯軌。現有制度沒有充分吸納青年及其新價值，既未能實踐世代更替，亦加劇了青年與主導意識形態的矛盾。其次，現行政治、制度及法規均存在惰性，依循上一代的積習及意識形態而行，沒有認真看待青年推動社會轉變的角色及潛能，甚至與之背道而馳，令青年與環境出現錯置。最後，主流社會難以再透過學校、工作機構、民間組織等社會單位去發掘青年的同質性，「青年」得以被形成、認知、觀察的制度正逐步消解，令青年離根。因此，牢固難變的制度與轉變中的青年，令兩者失去應有的扣連，並衍生各種張力與矛盾。社會需檢討既成制度及規範，與新世代的需求和期望有何落差，如何改變制度讓青年成為促進社會轉變的力量。

人口老化對社會、家庭和個人都有重大的影響，既帶來機會，亦添加挑戰。何靄婷、黃芷翹和馮海嵐檢視了回歸後的人

口老化趨勢、家庭結構和觀念變化，從長者經濟保障、長期照顧、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安老期望，說明制定相關政策和社會配套的重要性。壽命延長及生育率下降令高齡人士的人口比例急速上升，65歲及以上長者由1996年的10.1%，增至2016年的15.9%，2064年將高近三成半。與此同時，家庭結構出現少子化和核心化的趨勢，加上個人主義蔓延和家庭觀念轉變，家庭難再發揮養老保障的功能。現時，退休長者多缺乏穩定的收入，個人儲蓄的強積金和政府提供的經濟支援，實不足以解決長者貧窮問題，設立完善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是其中一個出路。此外，政府投入安老服務的經常性開支雖增近三倍半，但提供的長期照顧和醫療服務，一直供不應求，對私營服務又監管不足，導致質素參差，不能全面紓緩照顧長者的壓力。雖然政府有通過長者就業計劃、建設長者友善社區、推廣尊老精神等方式，鼓勵長者於社會、社區和家庭等不同層面的參與，但因政策缺乏可持續性和配套措施，而成效不彰。因此，政府需緊貼長者需要和環境轉變，更新政策思維，制定有效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以改善長者福祉。

最後，方偉晶和千一卿概述了內地新移民及少數族裔居港群體的人口和社經特徵，分析他們的經濟適應情況，並探討市民對這兩個群體的接納態度。就內地新移民而言，此群體呈現兩極分化的結構，一是通過單程證來港者，其人數較多，但學歷和社經地位偏低，經濟適應欠佳；另一是內地技術／投資移民，其人數雖少，但具有較高的學歷和社經地位，應較易融入社會。可是，由於市民缺乏接觸後者的機會，對內地新移民的印象，實建立在單程證移民之上，因而容易出現排斥情緒和不友善的行為。就少數族裔居港群體而言，其內部高度分化，不僅種族類別眾多，各種族的人口特徵、職業和收入分布，也存在差異。市民對各少數族裔的態度亦不盡相同，主要是基於該族裔的社經能力和地位，如對白人和東亞裔的接納程度，便顯

著高於東南亞裔和南亞裔。香港與內地加強融合，內地移民群體的結構會否出現新的變化，如何讓內地移民和少數族裔都在香港找到公平點，共享繁華，均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秉持學術獨立信念，恪守言論自由原則，堅信兼容並包，才能令不同意見相互激盪，蓬勃發展。本校同仁對公共事務立場不一，各持己見，份屬正常。因此，本書收錄的25篇文章，正代表了多元的學科背景、政治觀點與研究進路。我們毋須認同彼此的立場，但會共同捍衛發表不同觀點及研究成果的自由。我們相信書中文章表達的立場，或會引起爭議，但也是一家之言，各立基於嚴謹的理論、客觀的數據和理性的分析，可以提出來供公眾討論，甚至批評。

一直以來，香港亞太研究所致力推動關乎香港長遠發展的跨學科研究，本書各章展示了同仁在實踐這學術使命的成果。此外，我們亦非常重視以所知所長，加深社會各界對有關議題的認識，協助大家進行理性討論。我們在不同議題上的研究進展不盡相同，在有些問題上仍需努力、加強，不過，我們會不斷檢討、反思，因應社會變化開拓新課題，以求科研成果能為社會所用，完成高等院校的知識轉移任務。

張妙清、趙永佳

2017年6月